

用爱与责任守护希望

——市人民医院产科团队小记

张丽萍

年获医院先进集体称号。

凝聚大爱暖人心

5月6日一大早,产科住院医师醋海艳刚查完房,就接到了120的急救电话——一位怀有7个半月双胞胎的高龄

成死胎、产子宫破裂、失血性休克,甚至危及产妇生命。

“立即开通绿色通道!”随着王情的果断决定,产妇被迅速送进手术室,紧急施救。十几分钟后,一对龙凤胎出生了。但由于母体条件差等原因,两个

特色服务有温度

5月14日14:30-15:30,《有氧运动》,授课老师李莉;5月16日14:30-15:30,《孕期瑜伽》,授课老师亢兴娟;5月16日15:30-16:30,《母乳喂养》,授课老师何蒙;5月18日9:30,《分娩方式的选择》,授课老师任建利……这张“授课安排表”,详细地列出了产科的一项特色服务——孕妇学校。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在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时刻,一些年轻夫妇难免会出现紧张、畏惧、不知所措等心理,如何引导他们对怀孕、分娩方式及产后母婴护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开设‘孕妇学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亢兴娟是孕妇学校负责人,她说,“孕妇学校”主要是对准妈妈和准爸爸进行产前、产时、产后三个时期相关知识的宣教,以及保养等专业知识的宣讲。

除此之外,市人民医院产科门诊还设置了专业盆底功能障碍治疗及母乳喂养咨询服务,为门诊病人提供专业的第一手指导和帮助。“护士长王新惠和其他两名护士均已取得国际母乳喂养指导师认证资格证书。”王情告诉记者,科室护士不仅个个照顾产妇得心应手,而且人人都是“催乳师”,都具有产后的专业母乳喂养指导能力,保证每一位新生儿产后一小时都能喝到母乳。与此同时,产科病房还开展了新生儿抚触、洗澡等业务,与中医科协作,为产妇提供产后“穴位贴敷”服务,缓解产后疼痛感。

“孩子哭了,母亲笑了,我们的心就安了!”这是产房护士长黄艳红常常说的一句话,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初心,才让这份成就感满满的事业,始终飘溢幸福的芬芳。



孕妇在围产监护室进行胎心监测



紧急救援后产妇生命体征平稳

她们,用耐心为准妈妈普及孕期知识;

她们,用细致守护生命健康;她们,用大爱确保母婴平安……她们,就是人民医院产科团队。

技术精湛敢为先

走进市人民医院产科,悬挂在墙上的一面面锦旗格外引人注目。



医务人员教孕妇做瑜伽

产妇在家里破水了!情况紧急,来不及多想,醋海艳与助产士跳上120救护车,向市区宝平路一小区疾驰而去。

“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孕妇双胎妊娠、胎膜早破,其中一胎处于横位。母体患有慢性高血压,并发子痫前期。在回程的救护车上,我们就向科主任汇报了患者的情况,科室立即联系了B超室、麻醉手术科、新生儿科科室。”醋海艳告诉笔者,持续监护的过程中,她们发现,产妇肚子中的一个胎儿胎心突然减弱,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造

孩子出生后没有心跳和呼吸,电解质紊乱、感染严重,大家刚刚放下的心又悬起来了,立即投入了另一场抢救中。因为抢救及时,目前,产妇和两个孩子生命体征均已平稳。

“在医院,产科是一个尤为神圣庄严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不仅见证着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更守护着母亲和孩子的生命安危,很多时候都在忙碌和紧张中度过,无数次险象环生的手术经历让人至今历历在目。”王情动情地说,“每一分钟都是抢回来的!”

见证

李航 / 主编

“英雄”二字重千钧。在鲜花、掌声与荣耀的背后,注定是负重前行。郎平的身体至今仍残留着老女排时代的“馈赠”。经历了多次手术后,她偶尔开玩笑说:“现在境界和追求都没那么高了,能正常走路、正常生活就行。”可是,有些东西她始终放不下。

“我是老女排最后一个在一队的,应该为中国女排传承一点东西,留下一点东西。”在郎平看来,这东西不只是冠军和金牌。有时候明知不会赢,也竭尽全力,虽然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然目光坚定——郎平花了半辈子时间,讲述着一个“为排球而生”的故事。

把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

时光倒转到2016年8月21日,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第四局,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主攻手朱婷高高跃起,一个势大力沉的重扣,竟然砸得对手倒地不起,彻底击垮了塞尔维亚队员的信心。“真像当年的‘铁榔头’!”观众席上发出惊叹。

而此时,站在赛场边的郎平目光如炬,所有精力集中在瞬息万变的战局。她并不觉得紧张,即便一时比分落后,她依然淡定自若,暂停时鼓励队员们:“慢慢来,一分一分拿……”当惠若琪奋力扣下最后一球,奥运金牌时隔12年再度挂在中国女排队员的胸前,郎平已然累得没有力气兴奋了。

“在里约20多天,我整整瘦了7公斤!”纵使久经沙场的郎平,也没想到这条路如此曲折。奥运小组赛只交出2胜3负的成绩单,从“死亡小组”惊险出线后,东道主巴西队成为无法选择的淘汰赛对手。过往8年的19次交锋,中国女排只赢过1次。绝大多数人预测,中国姑娘要打道回府了。

打巴西队的赛前准备会上,郎平笑着做战前动员:“这训练馆咱们订到决赛那天,提前走人家也不退钱了,所以得练够本,对不?”队员们搭起手,齐声回答:“我们还多想打几场球呢!”那一刻,郎平把“可以被打败,绝不能被打倒”的血性,灌输到每个人的体内。

在“魔鬼主场”的震天嘘声中,中国女排把整个巴西打哭了,通往冠军的大门从此开启。郎平的临场调度与排兵布阵被赞为“神来之笔”,而这一切力量的来源是信念、意志和勇气。“想赢中国女排没那么容易,输了也得拼对手一层皮。”主教练的气场就是一支队伍的士气,局势再险恶,中国女排的士气不散,先心理崩盘的总是对手。

幸运女神并不慷慨,所谓逆袭或运气,不过是强者的谦辞。在郎平当时的竞聘陈述中,时间表是以2016年里约奥运会倒计时来设计的。为了锻炼队伍,她敢于舍弃一些国际比赛的成绩,敢于自我纠错、临阵换将,大胆起用新人,最终3年上了3个大台阶。从世锦赛亚军、世界杯冠军到奥运会冠军,中国女排捅破了世界三大赛10年无冠的窗户纸,郎平把所有“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女儿把一生都献给了排球”

2013年郎平决定重新出山时,中国女排正处于教练频频、士气低落的混沌期,有人劝她不要以半世英名犯险。“我一直犹豫不决,后来一咬牙一跺脚,上吧。”郎平最终将所有顾虑放在一边,挺身而出。“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退休前再为中国女排努力一把。”

其实,这并不是郎平第一次临危受命。1995年初,时任中国排协主席的袁伟民一

句“祖国需要你”,女儿只有4岁的郎平毅然回国执教。短短一年半,她把低谷中的中国女排带到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的领奖台。国际排联首次破例把“世界最佳教练员”授予亚军主教练,听说郎平因为重压和操劳,晕倒在奥运村食堂,父亲落泪了,“女儿把一生都献给了排球啊!”

为排球付出,郎平无怨无悔,而老女排的身份,更是伴随她一生的烙印。1977年,17岁的郎平被“伯乐”袁伟民发掘。袁指导不仅拍板吸收郎平进国家队,进行独创性的严格训练,更敢于把一个没有国际大赛经验的新手推上关键位置,正是这份远见卓识,造就了世界三大主攻手之一的“铁榔头”。

一锤定音的重扣,定格下郎平标志性的镜头。从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五连冠”壮举,郎平成了全民偶像。退役后,很多老女排队员都走入安稳的仕途,郎平却做出令人意外的选择——留洋读书。为赚了学费,她一度远赴意大利打球,后来到美国继续攻读体育管理硕士学位。用她的话说,那会儿虽然穷,但是很快活。

那段时间,郎平几乎在国内媒体的视线里消失,直到1995年回国,人们惊喜地发现“铁榔头”变了。“这8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历练了我的心智,我已经把自己这个‘世界冠军’一脚一脚踩在地上,踩得很踏实。”郎平在自传中写道。第一次执教国家队的4年,被郎平视为一生的成熟期,锤炼出真正的气概和自信。但超乎想象的工作强度,消耗着郎平的身体,也让丈夫白帆与她渐行渐远。1999年,郎平无奈辞去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重新踏上“漂泊”之路。

(连载4)

但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这些干部家属的日子同样难过。生产队分不下粮食,于是他们常常要偷偷摸摸地去黑市上买粮吃。日子过不下去还经常欠款,并且三天两头被追着要求还钱。真正实行土地承包后,他们意外地发现,粮食完全够吃了,手里的钱也有宽余的了。于是态度大变,转而拥护土地承包。

1981年,中共韩城县委书记刘群效在向有关部门汇报全县落实农业责任制的问题时说:

农业生产责任制解决了县上干部超支问题和给家里买粮的问题,县上干部说好,在外地回来的职工和县上的双职工,没受过到外地买粮和催交超支款的苦,说责任制是右。

显然,此时反对责任制的是那些已经改变了农民身份、脱离开农业劳动的人了。

其实,就在社会上各种议论争论不休时,一些具有丰富农村实践经验和相应理论水准的人早已经敏锐地看出来,如果能让农民和农业进一步发展,就要在从前那种位置上继续朝后退,而且一定要毫不犹豫、大踏步地后退。用华县毕家公社毕家生产大队大队长刘新业的话说:应当把土地分一半给农民,一半种粮,一半种棉,粮食产量肯定会比现在翻一番。而临潼县西泉公社干部赵如意则说:现在棉花生产只联产到组,如果能联产到人,亩产会更高,能达到150斤!

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这样的胆量,人们只敢半明半暗地搞联产责任制,只能睁大眼睛看着安徽和四川,更具体地说,是看着北京。

北京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呢?

应当说,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上究竟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政策,两种思想、两种观点始终在激烈交锋。当时主抓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是陈永贵。

早在1975年,陈永贵就致信毛泽东,提出中国农村的“过渡”计划。计划的第一条就是将“农业六十条”规定的三级所有,过渡到大队所有。陈永贵坚定地说:这种过渡“势在必行”。

或许是有了那三年大饥饿的教训,这一回毛泽东没有像1956年那样,将集体化运动热火朝天地强力朝前推进,他只是把陈永贵的建议转交政治局去讨论。

与此前困难时期中央制定的“农业六十条”相比,陈永贵一手搞起来的大寨,以及大寨所采取的做法,显然严重地偏“左”。如果在这条“左”的道路上不加节制地走下去,带给中国人民的根本不是什么幸福生活。

1976年12月,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三个月,中国百废待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当时的党中央却再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此次会议距上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仅间隔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不久,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内,要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于此。1977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说: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要开始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普及大寨县的标准之一”。座谈会要求当年冬季和1978年春季选择10%左右的大队“先行过渡”。会议形成一个汇报提纲,即《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党中央随即以1977年49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汇报提纲。

非常明显,座谈会将已经严重偏“左”的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又一次推向了更“左”。怎么办?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邓小平。中央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召开的同时,安徽省委也正在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万里等人力排众议,最终以省委决定的方式出台了“省委六条”——“六条”与刚刚下发的“49号文件”是截然相反的两极!如果说,中央49号文件字字句句都是对安徽“省委六条”的批判,那么安徽“省委六条”则针锋相对,在



莫伸 / 著

字字句句否定49号文件的“穷过渡”!

至今没有任何资料披露,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派万里去安徽,是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万里上任前,专程去拜访了邓小平!

1978年,这是中国发生伟大历史性变革的一年。这一年春天,无论自然气候还是政治气候,最大的特点都是乍暖还寒。

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央领导头脑里最感麻烦的问题。此前,邓小平已经几次不动声色地表示出自己对农业政策的态度,只是他的所有表态都没有登报,也不对外宣传。因此许多人都企盼。

1980年4月2日,当中央高层围绕着包产到户等敏感问题争论日趋激烈且由于相持不下而处于胶着状态时,邓小平终于站出来说话了。邓小平在跟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中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地区,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邓小平又在跟胡乔木和邓力群的谈话中,再次谈到农村政策。(连载23)

作品连载